

論當代中國文化的重建 與當代世界文化的重建

李鵬程

一、文化重建的哲學前提是思想反思

討論什麼是文化重建的問題，是關心文化、關心歷史發展前景、關心人的生存命運的學者的學術志趣。

重建就是對現實狀態的文化進行一個重新的構造；而進行重新構造的精神動力，應該是起源於對現實文化狀態的一個評價，這個評價的通俗表述，就是認為現實文化狀態還有其需要改進、需要完善之處。

實際上，從哲學辯證思維的觀點看，文化與世界上所有事物一樣，可以說它時時都是完善的，但時時又都是不完善的。完善是相對於此時之前的更不完善而言，不完善則是相對於此時以後的理性狀態而言。因為它們文化狀態時時都處於變動之中，所以，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對文化的變動有一種期望，那就是希望實現我們的文化理想。這也就是老黑格爾所說的那個意思：“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¹既然是合理的，為什麼還要“重建”？而“重建”的理性要求又為什麼又是“現實的”呢？這裏恰好也就是表達了文化學者的一個“文

¹參見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第6頁。

化情操”——總是抱有一個崇高的文化理想。這個文化理想，就是立足於對現有文化的在文明財富已然積累的基礎之上予以積極肯定的一種“反思”，一種對於“不足”的繼續完善，對於存在的問題尋找可能予以解決的理論答案和實踐方案。所以，重建在其理性意義上，是哲學反思，是以各種話語形態（包括文學藝術諸形態的話語）表達出來的、但最終是哲學性質的反思，包括理論反思和實踐改變。這個實踐的改變就是“重建”。

二、從文化反思到文化重建的方法論

文化重建就是要實現一種文化理想。而文化理想是從哪里來的呢？

按照哲學的說法，是來源於思考者的“文化有意識”，而按照當代漢語的日常說法，就是來源於人要促進文化“前進”或者促進文化“昇華”的一種“覺悟”。也就是說，人只是在“文化有意識”的情況下，即具有了促進文化昇華的“覺悟”之後，才能具有文化理想。不然，人就是處在不覺悟或者是文化麻木狀態、文化無意識狀態。關於這種不好的消極狀態，我們以後再作專門論述。這裏只就在文化有意識和有覺悟的狀態下如何進行文化重建進行一些簡略的探討。

首先，文化重建必須要對一個民族的文化整體進行反思，這裏強調的是“整體性反思”。因為只有整體性反思，才能有可能達到對系統重構、重建的整體性認識。通常，人們慣於對現實中的文化的生活世界進行日常性議論，這些議論還都是失之話題限於零碎和個別性事物，或者不同的人們只是在個別領域對文化反思進行強調而形成對於文化反思、從而對文化重構、重建的不同理解，甚至在意見（識見）之間並不進行交互討論的工作，而是各自進行各自的“宣示”。例如文學藝術

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政治軍事學家、民族學家和人類學家，都會對文化反思、從而對文化重建有不同的著眼點和不同的理想圖式這應該說是很正常的。但是，這樣的個別性反思路徑和重建圖式，儘管可能是十分專業的，是切合本領域實際的，不過，對民族文化整體性而言，這種反思路徑和重建圖式的想像力，無疑也是對文化學者個人本身對文化整體性的有意識即文化覺悟的一種自我局限。如果認識不到這種局限，那麼，在一定時候，就會由於特別強調和突出自己思想本身的真理性，而把其他不同的反思思想和理想圖式視為“異端”或者“干擾因素”，而加以嘲諷、否定以至於排斥。例如前些年，一些經濟學家就曾經把對“文化（實際上是意識形態）”重要性的強調和社會公平的強調，均稱之為對經濟發展思想路徑的一種“干擾”。而中國經濟發展的“單打一”傾向盛行的實際後果的不如人意，恰好證明了這些經濟學家的目光短淺。我在這裏所要強調的就是，各方面學者在對於我們民族的發展即民族文明、民族文化整體命運的思想路徑和理性圖式方面，都應該放開眼光來重視文化整體性問題，不但要貢獻自己的專業思路，而且要思考民族大文化在經濟、政治、社會、意識形態這四個大方面的相互聯動、相互配合、相互平衡、相互嵌入和相互融匯的複雜關係，從而構建我們各個方面的學者的文化重建的真正“共識”，推進文化整體性重建的可能性。這樣，我們所討論的文化重建，才能有一個整體性的系統思維路徑和全時空的理想圖式，才能真正促進我們的民族文化的全面的、良性的重建。

其次，文化反思從而文化重建的思想路徑和理想圖式，來自於文化研究者進行文化比較的學術勞作。文化比較應該有兩個方面的比較。一個研究的方面是對諸文化（諸文明）進行地緣空間的比較，或者也可以叫作國別比較，或者叫作不同文化

共同體之間的差別比較。另外一個方面是對研究對象本身進行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狀況的差別的比較。

關於第一個方面的比較，大多數文化研究者比較熟悉。例如中國文化狀況和外國文化的比較。中國與西方的比較，包括中國與西方總體的比較，中國與西方各國的比較，還有中國與鄰國的比較，中國與世界各大洲、各地區的比較，等等。

在文化地緣空間比較之中，我們會形成“文化際”意識，即文化關係意識，那就是：文化“差異”、文化“共存”與文化“融匯”三種意識。也就是說，文化比較導致文化關係研究的各個側面和各個層面。而文化比較所導致的文化關係研究，使我們追尋下面幾個問題的答案：中國文化與它們的差異是什麼？它們有什麼文化發展事實可以作為我們的經驗案例和教訓案例，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如何與它們在這個已經聯繫很緊密的世界上相互共處？如何消除相互的衝突而保障自己文化的發展？如何與它們進行文明發展交流和文明發展合作？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清晰化，是我們建立自己的文化理想和推進我們中國自己的文化重建的必要前提。

關於第二個方面的比較，實際上就是對我們的“文化時代”的時間性的認識。中國人經常說“貫通古今”或者“今非昔比”，這從不同的思考立場道出了歷史比較的複雜性和艱難。但是，也正如我們的歷史知識告訴我們的，歷史事件常常與現實事件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而歷史慣性的中斷也常常警示人們，現實的發展也許真會爆出“出人意料”的活劇。總之，歷史上的許多東西，都可以給我們以方法論和經驗教訓的隱喻和啟迪。

這裏應該特別強調在文化的歷史比較的大框架中的“傳統的繼承與批判”的學術話題。從兩個角度來看一下：如果糾結於對歷史傳統的忠誠保守，這會使我們把今天當作昨天，把昨天當作今天，使我們當下的文化意識失去時代的鮮活性，而使

我們自己成為對於時代來說的“無語者”和“無所作為者”，因而也就從根本上沒有資格談論對我們時代的文化進行重構和重建的問題；而如果我們對傳統採取斷然決裂的態度，果斷地意氣用事，則又必然背負上“無祖無宗”、“離經叛道”、“六親不認”的歷史虛無主義的罵名。那麼，如何才能以合適的分寸，處理好繼承傳統與創新重建的關係，就必須對現實和歷史兩方面的各自性質，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進行超出一般的學術套話和現成的邏輯套路的、更為深入的思考。

最後，文化反思應該應用現象學還原的方法，抓住文化現實的問題性，考察人的“最真實的生存狀態”，以其作為強有力的“證據”，來“體悟”當下文化事實的“自我求變”，理解文化自身要進一步“向文而化”的文化自我運動的應然性和必然性。從而理解“時代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文化歷史大勢。所謂現象學還原方法，說得通俗一點，就是暫時把時下流行的各種文化理論、各種文化學說暫時“擱置”一下，而真誠地、毫無旁騖地把研究眼光和思考意向投射到當代人的現實生存狀態上面，從這個生存狀態的真實性上，抓住時代的根本問題、綱領性問題和諸層面的主要問題，從各個方面各個領域系統性地、全面地推進問題的解決。這樣一種文化反思，在擱置了當下流行和慣用的各種形形色色的文化理論、文化學說之後，是不是會成為反思者個人的一種極端主觀的隨心所欲的意識狀態呢？應該說，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我們已經確定了“體悟”這個感覺和其導致的思維活動本身，其意向是把人的現實生命狀態作為文化的根本層面的，並在這個層面上，確定（生成）、列舉、歸納和總結人的現實生存狀態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該就是當代文化重建應該加以解決的真問題。

在這裏需要提到的是，以現象學進行的文化反思，由於它暫時地擱置了一切當下的理論和學說，因而它需要一種“直覺”，即直接面對現實事實，而在“直接面

對”的時候，也就是在“體悟”人的活生生的現實生存狀態的時候，文學藝術家“觀察”“解讀”現實的眼光，他們對現實進行言說的話語形式，無論是文字的書寫和各種平面符號的表達，也無論是N維圖像和動作、表情的表演顯示，都對文化反思過程中的“體悟”的獲得，具有重大的現象學方法論的意義。

在我們對文化反思的上述方法有了一定的把握之後，接下來的工作，就是應用這些方法，即把作為促成文化重建動力的真問題，放置到整體性要求的框架中進行系統化和整體化，再把被系統化和整體化了的問題應用文化時間比較研究和文化空間比較研究，來找到重構新文化系統和重建新文化理想模式大廈的道路。

三、當代中國文化重建和世界文化重建的問題

那麼，我們從對人的現實的生存狀態的“有方法的”把握中，獲得的當代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重建的問題是什麼呢？

首先，我們應該看到的是，當代中國文化問題和當代世界文化問題的“關聯性”以至於“同一性”。由於人類現實生活的密切交往性質，實際上，在現時代，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已經逐步融為一個文化，中國文化問題和世界文化問題也就成為了同一個問題。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應該說，就是在當代對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同一性進行論證和闡釋的哲學人類學基礎。

當前，在文化重建問題上，狹隘民族主義和狹隘國家主義的觀點、立場和態度，已經成為被當代人們唾棄的過時的文化意識。而對跨民族的、跨國家的人類共同命運的強調，則已經越來越被世界廣大人類群體所認同。

對這個“共同命運”的概念的規定性在文化重建的學術框架中予以觀照，我們首先看到的問題和任務就是批判和消除“作為國家或者民族的文明體”的“自私性”的重建任務。當然，國家和民族作為人類文化和文明的群體形態和組織形式，它們不可能馬上消亡，也不可能被人為地“解散”或者被消滅。但是，例如在實際利益問題上，單邊主義的自私性是必須批判的。世界人類越來越懂得了更多的“雙贏”、“共贏”和“多贏”的文化可能性，“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文化意識，現在已經不只被認為是中國古人嚮往大同理想的詞句，而是在全球化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的響亮的現實生存口號，它們已經逐步成為世界人類的共識。

在實際上，要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一種世界文化和中國文化，我們一方面要使得理論概念的研究和大眾化普及深入人心，而另一方面，則必須以各種現代工業和科學手段，推進人類交往進一步緊密化，因為“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現實的社會組織形式，才能使人們越來越懂得生存命運的相互的息息相關，才能為化解國家間、民族間、地區間、宗教間以及宗教派別間的爭端與衝突創造現實的條件。

在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過程中，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組織和各個社會組織，都應該以積極的、善意的智慧方式，促進與“他者”的溝通、交流與合作，都應該以積極務實的態度和善意的實際行動，包括物質財富方面的和社會福利方面的適當讓渡，來促使矛盾、衝突的化解。比如說，我們中國人在對“一帶一路”建議的實踐推進中，已經做出了一些成績，但還應該做得越來越好。

其次，當代文化重建，必須加強“公共性”建設。“公共性”就是普遍的平等，就是以文化空間的開放性和文化交往的秩序性和規則性顯示出來的社會均衡與社會平等。例如我們所說的“公共設施”，在這個詞語的廣義上，應該指的就是所

有人都能享用的設施。“公共”就是“所有人”享有權利和獲得福祉。這裏的主題詞是“所有人”。

公共性設施的建設水準，是文化共同體（國家、民族、地區組織等）的文明水準的具體標誌。一個好社會，應該就是一個公共性水準較高的社會。

人類文化和文明的發展，就是一個不斷從特殊性、分割性、封閉性向着普遍性、融合性、開放性和公共性逐步發展的漫長以至於包含了許許多多艱難曲折的歷史過程。所謂“文化”（“文明”），從其實質性的定義簡而言之，指的就是人類公共性的發展、其成果和其所達到的歷史水準。從量的方面來說，就是公共空間的大小，普通人活動領域的大小。從質的方面來說，就是人類等級制和等級局限逐步消亡的程度，其伴隨着的文化價值，就是仁愛和善良願望的實現程度。

當然，人類的仁愛價值和善良願望的實現程度，在其根本上必然受到歷史現實的物質條件的制約，但其制約也並不是絕對的，在每一個歷史時代，它都有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的可能性的值閾。比如在當代社會文化（文明）評價中，就有“福利國家”和“競爭性國家”的差異，當然也應該有這兩個模式的相互融通。但融通則有兩種可能的後果：積極性文化要素的融通與消極性文化要素的融通。儘管如此，文化重建的要求和願望，應該會找到一個恰當的新模式。對新模式的評價，最有效的價值標準就是設計合理的國民幸福指數。

對於我們中國來說，社會主義按其本意就是要把人從歷史上存在的等級制的文化（文明）形態中解放出來，所以，社會主義條件下逐步擴大公共性的文化建設，逐步縮小並消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等級制或者社會分工所帶來的等級制差異，例如我們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所說的“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在這些方面我們已經做了很

多工作，但還應該繼續努力。同時，這幾十年來新的經濟發展形勢在社會公共性建設方面又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需要我們堅定地把握社會主義新文化新文明的公共性本質，在新文化重建的過程中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把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得更好。

強調公共性建設的文化重構和重建，對於全世界人類來說，就是要利用新技術革命帶來的幾乎是日新月異的便利條件，繼續加強全球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溝通、合作和融合，以使各國家、各民族、各地區的人們在知識、價值和利益、審美等諸文化領域有更多獲益和共用。

與古代社會基本上是一個宗法等級社會不同，“現代化”模式的現代社會基本上是一個以利益集團化（公司制）為主體的社會。現代政治國家在其實質上就是這個國家內的大的利益集團在政治價值方面的代理人。而社會公共性是“寄居於”利益集團的利潤獲得的基礎上的附屬物。現代政治國家能不能轉變成為國民現實利益的代表者和體現者，關鍵就在於看它能不能成為社會公益的代表者、執行者和維護者。社會公益就是公共性的文化價值在社會組織活動領域的具體體現。

近年來，現代國際社會的現實狀況十分複雜，單邊主義、分離主義、分裂主義似乎有所抬頭。以自己國家利益至上的名義，奉行自我孤立的國際政策，退出國際公約，撕毀國際協定，在國際關係中動不動就一意孤行，擺開要製造緊張局勢的架勢……這些都與人類文化（文明）的進步發展是背道而馳的，是與人類文化的“公共性”建設的成長相背離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能看清楚，公共性確實是文化（文明）與野蠻的試金石和分水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能夠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議對於當代人類文化（文明）的歷史進步的導向性作用。

再次，當代中國的文化重建和世界文化的重建，一個非常艱巨的文化任務，就是要在人類文化（文明）發展的框架中，重新反思並重構人類與大自然世界的關係。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日益為越來越多的人們所理解並重視。

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人類文化問題的一個核心問題。中國古代思想家的“天人關係”學說中就包含了關於天與人的關係的豐富而睿智的論述，西方近代以前的哲學家們大多也多有關於人生論與宇宙論的關係的學說，更有豐富的“自然哲學”的思想。

只是在西方近代以來，隨着人本主義對宗教批判的凱旋，隨着科學技術的文化能動作用的有效性的實際展現和發揮，形成了一股人類中心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思潮，並且，這些思潮在影響人類生存狀態的巨大改變的過程中，日益發展成為現代西方主流的意識形態，主導和制約着人們的文化價值觀念和日常生活態度。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文化，就被解釋為人本主義和科學。

我們說，相對於西方中世紀的神本主義文化而言，人本主義具有確定的進步性。但是在“上帝死了”之後，人類是不是就是自己的絕對主宰和自然界的絕對主宰呢？西方思想家們過於自信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使得西方文化在近兩個世紀以來處於對“人類自我中心主義”的感覺良好的迷戀之中。

科學的發展使得“科學萬能”、“知識就是力量”的豪言壯語鼓舞人類以其諸多優秀的科學新發現和高超而精湛的技術工藝不斷改變着大自然的宏觀面貌和微觀面貌，使人類獲得了日益豐富繁多的便利和福利。

但是，在人們歡欣地享受着現代科學技術的偉大成果的時候，過度的科技工藝卻給人們帶來了未曾料到的諸多文化問題：強大到可以毀滅人類的核武器和各種新式的可以覆蓋全球的打擊能力，由各種武器裝備起來的戰爭；環境被污染、海洋被

污染、大氣被污染，動植物生態被破壞而退化或者發生有害變異，有害化工產品直接或者間接地毒化着人的生命機體，地球上極端氣候和自然災害頻繁出現……這些情況日益嚴重地威脅着人類的生存。人類面臨生存危機！這是最大的現代文化危機。

在這種情況下，文化重建的重大任務，就是調整人與自然世界的關係，就是要有限開發、保護自然、對科學技術進行倫理評價並禁止和消除“惡技術”和“惡工藝”。

由於這個文化任務的實施，直接關係到對國家能否強大和國家工業化發展可能性的利益的限制，關係到對市場經濟中資本利益的限制，關係到現代社會組織實體的競爭態勢甚至於生存狀態，所以，這個文化任務的完成和實現，必然難題重重，頗費周折。但是，如果人類能夠對自己的科技成果所造成的這一系列問題的後果及其發展趨勢有清醒的理解和認識，那麼，可以期望智慧的人類能夠完成這個關乎人類命運及其生死攸關的文化重建任務。

最後，當代文化重建應該關注人的精神價值的重建。這個問題，在我們這個時代特別重要。其重要性在於：人是建構文化的行為主體，人的精神狀態如何，直接決定着人對新文化的建構能力，以及人建構的文化的性質和其趨向。

從當代社會文化的普遍精神狀況來看，有四類狀況亟需改變：自私自利、信用缺失、金錢至上、消費和娛樂至上。這四種狀況，前兩種是就人的社會責任和人際交往規矩而言，後兩種是就人自身的生存價值遵循而言。

這些問題的出現，應該說，一方面根源於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有理”的謬誤，另一方面則根源於對發展經濟的目的性的誤解。

文化大革命作為現代中國歷史上的最大的社會動亂，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現實災難，比這個災難更為嚴重的，就是因社會秩序的被破壞和對理性規則的肆意踐踏，導致人們的精神失常，在價值觀方面形成對任性暴力的至上信仰和對一切理性規則的鄙視和“造反”。粉碎四人幫撥亂反正之後，整個中國社會逐步走向了依法治國和重建規則和秩序的新時期，但人的精神狀態上，還是漠視、忽視以至鄙視法律、制度和規則的思想烙印一直存在，其“陰魂不散”，以變相的方式鑽法律和制度規則的空子，搞邪門歪道。這種精神狀態嚴重挑戰社會文化（文明）的尊嚴和權威性，導致信任危機和各行其是的無序狀態，阻礙我們的社會進步。

改革開放的文化，是發展經濟的戰略，使得中國的經濟實力得到了空前的大發展。這是有目共睹的偉大成績。但同時，對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性的忽略與誤解，形成了目光短淺的發財浪潮，形成了對物質財富的絕對追求，這種追求導致了各種各樣的不擇手段，使財富欲望和金錢拜物教成為了億萬人最感興趣的精神追求。從而，崇尚奢華、極度消費和擺闊成為一時的社會風氣，它被商業利潤和媒體利潤的追逐者們肆意吹捧和極力渲染，毒化着人們的文化靈魂。

與此同時，對個性價值觀的半生不熟的因襲解讀，導致把個人存在的責任性予以抹煞，而把個人的文化合理性與自私自利混為一談，錯誤地把自私自利宣傳為“合理的”個性解放。還有所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論調和“厚黑”學說被吹捧，而以自私的目的進行勾心鬥角、陰險毒辣設計害人的“宮鬥戲”成為一時的文化流行。正是上述這種精神文化上的病態，使社會滋生出官場腐敗、無良媒體的唯利是圖的炒作，某些私人資本所縱容的各種低俗精神文化垃圾。所有這些不健康的精神傾向，都應該在整體性的文化重建中予以清除。上述情況警示我們，重建國民文化精神的任務，確實是十分艱巨的。任重而道遠！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文化重建所面臨的問題很多。這些問題的解決，歸結到兩點，就是應該對諸如“天下為公”、“仁愛善良”等文化精神價值觀念，在進行時代化的話語改造製作之後，真心實意地予以強調和在文化重建的實踐中貫徹。這些具有大胸懷、大氣度、大視野的理性觀念，能夠深入人心，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才能真正實現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歷史使命。

讓我們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古人遺訓的鼓舞下，為實現重建當代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理想而盡力！